

# 环保支出决策：渐进还是间断均衡

##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邝艳华

(广东财经大学 财政税务学院, 广州 510320)

【摘要】由于一味追求经济发展,环境治理问题一直未得到我国政府足够的重视,环保支出长期不足,导致环境污染持续恶化。面对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压力,国家治理理应作出积极的回应,但是,环保支出不仅没有得到逐年的稳步增长,而是处于剧烈的波动状态,甚至经历了大幅度的削减。为什么环保支出会出现这样的变化?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本研究以支出变化为切入点,分析了我国2000—2010年30个省的环保支出变化,发现其属于间断均衡模式。然后在间断均衡决策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决策者注意力-体制摩擦”的解释框架和两条研究假设,用我国环保面板数据对其进行了检验,发现预算决策由于受到决策者注意力和体制摩擦的共同影响,环保支出呈现出间断均衡的特点。当决策者注意力偏离环保事务和体制摩擦非常大的时候,环保支出很难得到大幅增长。

【关键词】预算变化;公共预算决策;间断均衡;渐进主义;环保支出;决策模式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97(2015)01-0052-10

### 一、引言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的增长,如同波兰尼所担心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总是伴随着不可忽视的环境代价,<sup>[1]</sup>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在过去30年中急剧地恶化了环境状况。<sup>[2]</sup>环境质量恶化激发出各种各样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为了应对这些结构变化和严峻挑战,国家不得不对治理制度进行适度重构,在市场化运动和社会自我保护运动这一充满张力的“双向运动”<sup>[3]</sup>中进行艰难的平衡和调适。

既然环境保护是国家转型不可避免的问题,环境污染治理迫在眉睫,那么政府环境治理上的投入是怎样的状况呢?一直以来,我国环境保护支出总体偏少,投入长期不足,<sup>[4]</sup>这在工业污染治

理支出<sup>②</sup>上表现得更为严峻,投入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持续下滑(见图1)。

面对环境恶化所带来的社会压力,国家治理应该要作出积极回应,那么政府到底作出了怎样的回应。根据笔者的实地调研,发现环保支出在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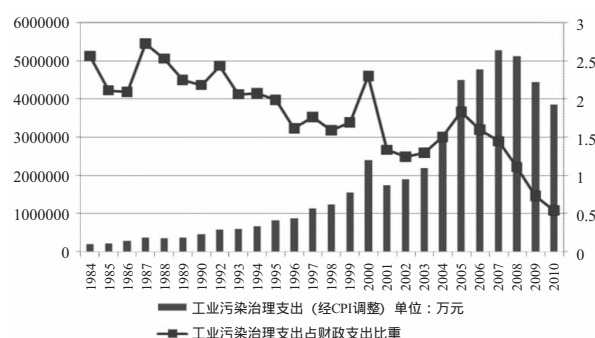


图1 工业污染治理支出

收稿日期 2015-03-28

作者简介 邝艳华,广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公共预算。

基金项目 本文为“推进生态城市建设的预算决策议程动力模型及应用研究”(13CGL152)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些年份会遭受剧烈的削减,那么,为什么环保支出不是持续增长而是反复震荡呢?要解释环保支出变化震荡的原因,需要深入探究决定预算安排的预算决策。

## 二、文献回顾和研究问题

为什么环保支出会产生这样的变化?预算决策到底是如何制定的?这些问题让很多人都感到了困惑,这个现实问题与科伊的经典问题不谋而合:在什么基础上,决定把X美元分配给活动A而不是活动B?<sup>[4]</sup>

尽管希克质疑科伊问题是一个错误的问题,给公共预算研究产生了很大的误导性,学者们却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索的脚步,答案推陈出新。在完全理性人假设下,沃克将古典经济学家庇古的边际效用理论进一步推进,认为预算决策遵从无差异曲线,最后一美元无论投在哪个项目上所带来的边际效用都相等。<sup>[5]</sup>里维斯把边际效用理论精细化,认为政府在进行预算决策时会考虑项目的相对价值、相对有效性,在实际限制的情况下进行增量分析,采用的方法包括了不定额预算法、限额预算法、工作负荷衡量法与单位成本计算法、预算增减分析法、优先性清单法和逐项控制法等。<sup>[6]</sup>理性主义风靡整个学术界,似乎只要专家琢磨出一套精细的模型,预算决策也可以抛开政治家,一劳永逸地精确计算预算分配额。

西蒙对基于完全理性人假设基础上的理性决策模式提出了质疑,认为在现实生活当中决策者的精力、知识、时间是有限的,甚至注意力也是一种稀缺资源,在诸多限制之下是不可能作出最优决策的,只能在组织规章制度、效率准则、组织认同等框架下作出满意决策。<sup>[7]</sup>林德布鲁姆将渐进调适模式引入了决策过程,认为决策是在众多行动者的讨价还价、妥协等互动中渐进地形成的。<sup>[8]</sup>20世纪60年代开始,有限理性、渐进主义逐步取代了理性主义,成为了重要的决策理论。芬劳和瓦尔达夫斯基敏锐地把渐进主义引入到预算决策当中,在林德布鲁姆渐进决策理论的基础上加入了政治冲突和官僚化两个重要因素,<sup>[9]</sup>认为预算参与者不会全面评估所有的备选项目,而是关注边际上的增加和减少,多元主义的决策模式是在竞争的预算要求者中分配资源的最优办法,试图将完全理性引入预算、把政治家赶跑的预算模式是注定失败的。<sup>[10]</sup>多项研究对此进行了验证,在美国各级政府、其他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预算实践中发现了很多支持渐进预算理论的经验证据。<sup>[11][12]</sup>

尽管得到一些实证数据的支撑,但渐进预算

理论一直受到质疑。贝利梳理出了已有研究中主要运用的“渐进”概念多达12种,<sup>[13]</sup>白利和扣勒发现瓦尔达夫斯基他们对“渐进”增长范围的界定过于宽泛,正负20%、甚至30%以内都归类为渐进的预算结果,<sup>[14]</sup>罗宾森的发现是一针见血的,认为学者们得出的结论只是迎合自己对“渐进”的概念而已,并非严格推翻任何理论假设,学界中对渐进主义的争议来源于对渐进概念界定的模糊和多样化。<sup>[9]</sup>后来瓦尔达夫斯基也慢慢地放弃了渐进主义,渐进预算模型仅适用于收入充裕和稳定的预算环境,渐进预算已经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取决于资源水平、政治文化和不确定性的因变量。<sup>[15]</sup>

在渐进预算理论停滞不前的时候,一些学者在积极地寻找出路,试图解释瓦尔达夫斯基无法解释的突变。吸取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均衡分析以及古生物学自然无跃进式突变的精髓,<sup>[16]</sup>鲍姆加斯特和琼斯把“间断均衡”概念引入到预算决策的研究当中,仔细研究那些渐进主义理论无法解释的突变,力图涵盖所有的预算变动,包括频繁的小变动和偶然的大变动。通过已有研究发现,间断均衡理论拥有良好的解释力,在不同国家、不同政府层级、不同预算科目都可以观察到渐变与剧变同时存在的现象。<sup>[17]</sup>

间断均衡理论是在美国民主政治的土壤中诞生,并且在西方民主国家中加以验证,从来没有走出民主国度,在非民主政治的背景下用于预算决策研究。那么,中国的预算决策到底是符合渐进主义,还是与间断均衡更为契合呢?

要研究预算决策制定过程,可以先从预算决策的结果——预算入手。因为预算贴着价格标签的一系列政策目标,是决定政策的各种偏好之间的冲突和政治争斗结果的记录。<sup>[18]</sup>国内政策议题驱动着政策制定,政策实际上又驱动着预算变化。<sup>[19]</sup>所以研究预算每年的变化,可以进一步总结出预算决策模式。可以说,预算变化是窥探政府预算决策的一扇窗户。

环境问题是各级政府共同面对、不容回避的问题,尤其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会自我保护意识逐步被日益恶化的环境所激发并迅速发展,社会自我保护力量与市场化力量之间的张力日趋紧张,环境污染治理就显得更为迫切。而我国70%以上的污染来源于工业,<sup>[20]</sup>因此工业污染治理是环境污染治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本研究试图透过环保支出变化这扇窗户,进而去探索预算决策过程的真面目。

本研究试图解答的研究问题是:环保支出变

化属于哪种决策模式,渐进的还是间断均衡的?为什么环保支出会出现这种决策模式?

### 三、研究设计与研究假设

####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来回答研究问题。对于第一个研究问题,本研究运用美国学者帕杰特总结出来的规律来分析环保支出变化,<sup>[21]</sup>如果我国环保支出变化属于正态分布,表明环保支出是渐进变化的,符合渐进决策模式;如果我国环保支出变化不属于正态分布,而是尖峰分布,则表明环保支出是间断均衡的,符合间断均衡决策模式。对于第二个研究问题,本研究用面板数据模型来识别环保支出决策的影响因素,从而解释环保支出呈现该决策模式的原因。

#### (二)分析单位

省级政府比中央政府更为贴近民众,受公民偏好、公民注意力转变、利益集团偏好、媒体倡议等因素的影响更为深刻,对当地环境质量的感受更为敏感,具有更明确的环境治理责任,同时省级政府的预算决策对公民的影响强度更大、影响范围更广。<sup>[24]</sup>因此,本研究选择省级环保支出作为分析单位。

本研究采用已有研究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文献中常用的中国省级行政区处理方法——把西藏剔除在研究样本之外,因为西藏的数据缺失非常严重。

#### (三)时间维度

出于数据完整性与可获得性的考虑,本研究选择2000—2010年作为本次研究的时间段。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00—2011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和《中国税务年鉴》。因此最终纳入本研究的面板数据样本包括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2000—2010年11年共计330个观测值。

基于本研究的数据模式,研究者采用面板模型来进行计量分析,用Stata13.0来进行数据分析。

#### (四)分析框架

鉴于间断均衡决策理论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不仅解释了预算呈现间断均衡特点的原因,而且从心理学角度解释了预算决策机制,揭示了影响决策的主要因素。因此本研究选用该理论作为分析框架来挖掘解释变量。

间断均衡决策理论的两大基石是注意力(Attention)和体制摩擦(Institutional Friction)。

##### 1.决策者注意力

有许多问题需要政府解决,但没有哪个政府

可以一次解决所有的问题。原因在于人们对公共政策问题的注意力是有限的,人们不能一次同时对所有重要的事情予以注意,而是根据信息在心目中的重要性,选择性过滤源源不断的信息,在不同的时间把有限的注意力分配到不同的问题上。在政府的决策过程中,有许多参与者在分配着各自的注意力,识别着不同的问题,或者关注着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当来自各方面推动力增大到一定程度时,以前政策均势就会被打破,就会有大量的原有的和新增的行动者介入决策过程,试图吸引决策者的注意力。

大多数时候,决策者的偏好是稳定的,而注意力是变化的,信息是丰富的,而注意力是有限的,在一个时间段只有极其有限的信息被注意到,决策者不可能同时应付所有的问题。注意力会随环境背景的感知而迅速转变,选择的偶发性改变就有可能出现。出现这样的变化,原因可能是有新的决策者牵涉进来,或者决策者受到启发,转而关注以前未能清楚表达的新议题,在特定环境中偏好被激活,注意力发生转移。<sup>[16]</sup>

##### 2.体制摩擦

吸引住决策者注意力,不意味着一定会产生新政策,原因就在于政府内部存在体制摩擦。体制摩擦来源于信息成本、认知成本、决策成本和交易成本。当组织搜索相关的信息,就产生了信息成本;当组织获得了这些信息,组织需要付出认知成本来处理信息;当信息处理完毕,组织需要在内部就决策达成一致,这就面临着决策成本;当决策制定后,组织需要作出承诺、妥协和监督,这就产生了交易成本。<sup>[23]</sup>当社会信号的强度足以吸引决策者有限的注意力,并且克服了组织内部的体制摩擦,相应的政策输出才有可能产生,反之,社会信号强度将会累积,直至“机会之窗”出现才产生政策变动。因此,一个组织的体制摩擦越大,政策和预算就容易发生间断均衡现象,而且间断程度越大。<sup>[2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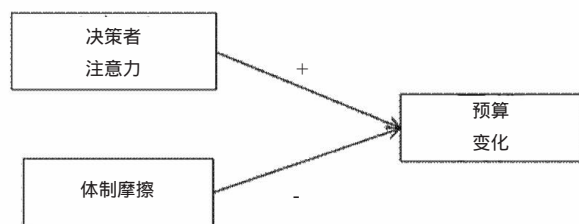


图2 预算决策分析框架图

#### (五)研究假设

##### 1.环保支出变化

我国的环保支出不属于法定支出,环保立法进程滞后,政府决策者注重经济建设而忽视环境



保护。由于缺乏法律的保护,以及政府的忽视,环保支出呈现出震荡的变化形态(如图1所示)。由此推断,我国的环保支出不符合渐进决策模式。

假设1 我国的环保支出符合间断均衡决策模式。

## 2.决策者注意力

政策议程的历年变化体现了决策者注意力的变化情况,<sup>[22]</sup>决策者注意力转换引导着预算决策的变化。如果环境保护能够成功进入到政策议程,就说明环保工作吸引了决策者的注意力、得到了决策者的重视,那么环保支出将会得到财政资源的充分保障。因为在我国地方政府预算编制过程中,政府领导(核心决策者)的政策意图(注意力)引导着各个行动者的预算编制决策。在预算编制的布置会上,财政部门会把政府领导的政策重点通知各个职能部门,职能部门在编制部门的项目支出时会尽量地往政策重点上靠,财政部门在审核部门预算时,一个很重要的审核标准就是是否切合政府领导的政策重点。因此,如果环保工作得到政府领导的重视,那么环保支出就很有可能获得充分的资金保障。

假设2 决策者注意力在环保上的积聚程度越高,环保支出的增长率越高。

## 3.体制摩擦

体制摩擦来源于信息成本、认知成本、决策成本和交易成本。<sup>[22]</sup>体制摩擦可以分为体制内摩擦和体制外摩擦,体制内摩擦指决策系统内部存在的体制性阻碍因素,包括信息成本、认知成本和决策成本,体制外摩擦指决策系统与以外的其他组织互动所产生的体制性阻碍因素,指的是交易成本。

假设3 体制摩擦程度越低,环保支出变化的增长率越高。

在当今这个互联网时代,信息每天以指数级的速度膨胀,互联网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日新月异,为个人和组织处理信息、搜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除此以外,我国公务员队伍的素质日益提高,因此我们可以假定,每个决策系统的信息成本和认知成本是大致相同并且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为了研究方便,信息成本和认知成本忽略不计。本研究所研究的体制摩擦主要由决策成本和交易成本来决定,<sup>[24]</sup>研究假设3分解成两个子假设。

假设3.1 决策成本越低,环保支出的增长率越高。

决策成本是指当决策信息处理完毕后,组织在内部就决策达成一致而需要付出的成本。<sup>[23]</sup>本研究用资源拥挤程度和科层化程度来衡量决策成本。

## (1)资源拥挤程度

当资源充足时,各个预算参与者容易形成共识,在多元主义的民主体制下,预算的年度变化是很小的,每年的预算基本上是在上年基数的基础上加加减减;当资源紧缺、赤字恶化时,共识瓦解,预算的间断程度变大,甚至连基数都纳入了预算审查的范围,基数也被颠覆了。<sup>[15]</sup>由此可见,资源拥挤程度越高,财政赤字越严重,决策系统中的决策成本就越高,因为要达成一致意见变得困难,需要各个参与者作出更多的妥协和让步。

琼斯教授等人证明随着赤字恶化,共识瓦解,美国联邦预算变化的间断程度却降低了,而不是瓦尔达夫斯基所讲的更为震荡。<sup>[22]</sup>原因是资源拥挤程度越高,决策成本越高,体制摩擦就变得越大,因此要作出任何政策改变和预算变动所要面对的冲突和对立越大,改变现状变得异常困难,此时预算变化是更为渐进的。<sup>[22]</sup>所以,资源拥挤程度越低的省份,决策成本越低,体制摩擦越小,它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变化的间断程度越大。

## (2)科层化程度

储波和莫伊认为科层化会降低组织的应对外界变化的能力。<sup>[26]</sup>罗宾森对学校的预算变化分布进行研究得出了与储波、莫伊相同的结论,科层化程度越高的学区,其预算变化分布的峰度系数越小,越接近于正态分布,也即接近于渐进增长模式,是因为科层化程度会增加决策制定时需要协调沟通的层级,增加了决策成本,增加了组织的体制摩擦,要作出政策改变变得异常困难,减少了组织主动进行政策改变的意愿,导致组织回应外界环境变化的反应非常缓慢,政策和预算的大变化出现频率比较低。<sup>[9]</sup>根据间断均衡理论的分析,科层化对预算变化大小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体制摩擦中的决策成本来起作用的,本研究试图对科层化与组织应对变化能力的关系作进一步的检验。

假设3.2 交易成本越低,环保支出的增长率越高。

交易成本是指当决策制定后,组织作出承诺、妥协和监督而需要付出的成本。<sup>[23]</sup>本研究主要用利益集团与政府势力对比所形成的治理格局来测量体制外摩擦。

莫腾森对丹麦地方政府的预算变化进行研究后发现利益集团的势力影响着预算间断程度,利益集团势力越强,行动者数量越多,政策和预算的变化也越稳定。<sup>[27]</sup>有学者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认为行动者数量较少的时候,政府制定预算决策的垄断性较强,此时预算渐进程度会减少。<sup>[28]</sup>公民和

政府关系越不和谐,政治冲突越大,政策和预算的间断程度越大。<sup>[24]</sup>

引入体制摩擦来分析这些关系,理论解释力会更强。利益集团势力越强,行政者数量越多,政府的决策垄断性相对来说较弱,形成多元的治理格局,此时的交易成本相对较高,因为政府制定决策时需要作出更多的承诺、妥协和协调来平衡各方的利益关系和政治冲突,这就加剧了体制摩擦的程度,要作出政策转型和预算大幅改变就变得非常困难,所以预算渐进程度越强;反之,利益集团势力越弱,行动者数量越少,政府拥有绝对的决策权威,形成单一的治理格局,此时的交易成本相对较低,政府只需要在内部达成一致意见,体制摩擦较小,因此预算间断程度越大。

在我国环境预算决策过程中,企业是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参与者,企业当中要数排污企业与政府环境政策的利益联系最为紧密,因为环境政策的松紧直接关系到排污企业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所要承担的成本和责任,直接影响排污企业的利润。具体来说,我国地方政府环保部门实施的环保项目,一般包括环境污染治理、环境监测如企业排污监测、环境管理如督促排污企业执行“三同时”制度以及环境科研等。这些环保项目会影响排污企业的短期经济利益和政府短期的税收收入,但会带来良好的政府形象,满足社会的整体福利需求。比如,政府加大环保投入,带来污染治理力度、企业排污监测精确度的强化,挤压排污企业偷排的空间,倒逼排污企业表里一致地执行“三同时”制度、淘汰落后技术、加大企业的环保投入,不可避免地增加了企业在环境污染治理中所承担的成本。因此,中国的环境政策所面临的交易成本主要存在于政府与排污企业之间。

#### (六)变量操作化

##### 1. 环保支出变化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环保支出变化,从预算变化来分析背后的预算决策政治逻辑。

计算公式:环保支出变化=(第t年环保支出-第t-1年环保支出)/第t-1年环保支出

由于已有年鉴上没有长期统计的环保支出数据,因而选用工业污染治理支出代替环保支出。

##### 2. 决策者注意力

本研究用环境保护在地方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中所提及的工作重点的排序这项指标来衡量决策者注意力在环保工作上的积聚程度。研究者在各省政府的门户网站上获取政府工作报告。

排序越前,说明决策者对环保工作越重视。编

码如下:如果排序为1,说明决策者对环保工作高度重视,此时编码为20;如果排序为2,则编码为19;如果排序为3,则编码为18;如此类推。如果在工作重点中没有提及环保工作,则编码为0,说明决策者的注意力完全偏离到其他工作上。

#### 3. 决策成本

##### (1) 资源拥挤程度

本研究采用哈特利-拉西特模型对资源拥挤程度的操作化方法,用预算赤字来衡量资源拥挤程度,<sup>[25]</sup>预算赤字用“一般预算内收入与一般预算内支出的差”来计算。“各省一般预算内收入”和“各省一般预算内支出”在《中国财政年鉴》中获取。

##### (2) 科层化程度

罗宾森用学校组织管理人员所占资源作为测量组织科层化的指标,由于在统计年鉴的已有数据中没有提供这个数据,因此本研究只好退而求其次,采用“环保机构中行政干部人员/环保机构总人数”这个指标来测量各省的环保机构科层化水平。“环保机构行政干部人数”和“环保机构总人数”在《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上获取。

由于资源拥挤程度和科层化程度反映着决策成本的高低,因此本研究用“预算赤字”和“行政干部人员占环保机构总人数比重”这两个指标来测量决策成本。

#### 4. 交易成本

排污企业数量越多,缴纳的排污费越多,说明排污企业越能形成强大的联盟与政府就环境政策问题进行讨价还价,千方百计阻碍政府出台更为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消解政府治理环境污染的意愿,那么政府要形成有利于污染治理的预算决策所要付出的交易成本越大,因此预算间断程度变小,环保支出的变化越小。本研究用“企业排污费征收额”、“交纳排污费的企业数量”来测量交易成本。

此外,地方政府的角色非常微妙。虽然地方政府加大环保投入可以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符合全社会的长远利益,但是如果地方经济高度依赖于第二产业,财政收入也依赖于第二产业的税收收入,那么严格的环境政策会赶跑已有的和想来的高污染企业,短期会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水平。有研究指出第二产业(包括制造业、采矿业、电力煤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是主要的工业污染源,<sup>[29]</sup>属于高污染行业,这些企业缴纳了绝大部分的排污费,如果他们贡献的税收同样占据总体税收收入的重要份额,那么政府为了保持地区经济稳定和财政收入水平,在决

策时不得不考虑排污企业的诉求。本研究用“第二产业税收收入占总税收收入比重”来测量交易成本。

因此,“企业排污费征收额”、“交纳排污费的企业数量”和“第二产业税收收入占总税收收入比重”能够反映出交易成本的大小。“企业排污费征收额”、“交纳排污费的企业数量”在《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获取,“第二产业税收收入”和“总税收收入”在《中国税务年鉴》中获取。

#### 5.控制变量

在模型中,本研究加入4个控制变量,分别为工业化、城市化、人口密度和人均收入。具体各个变量的操作化和数据来源见表1。

### 四、环保支出决策模式

#### (一)因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研究者先用消费价格指数对2000—2010年环保支出进行调整,得到实际值,然后计算出2000—2010年环保支出的年度变化值,由于进行增长率的运算,所以最后剩下30个省份10年的数据,合计300个观测值。

经过初步的描述统计,可以发现省级环保支出变化的极端值相距甚远,最大的预算增幅达到596.34%,是内蒙古2006年的预算变化,最大的预算降幅是-82.42%,是海南省2007年的预算变化。

环保支出预算变化的均值是19.87%,中位数是1.89%,所有预算变化的集中程度处于渐进变化范围以内。预算变化的标准差达到76.98%,离散系数为3.87,表明各个预算变化之间差别比较大,离散程度比较高。

表2 各省环保支出变化描述统计(单位:%)

观测值个数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离散系数
300	-82.42	596.34	19.87	1.89	76.98	3.87

30个省2000—2010年的环保支出预算变化,其峰度系数为20.94,高于正态分布的峰度系数3,初步判断它不是正态分布。

表3 各省环保支出峰度和偏度

观测值个数	峰度系数	偏度系数
300	23.08	3.60

#### (二)直方图分析

把300个环保支出变化制作成直方图,可以发现直方图的顶峰远高于正态分布线,其肩膀低于正态分布线的两翼,其尾巴略高于正态分布线的尾部,完全符合尖峰分布的特征,具有典型的“高顶峰”、“瘦肩膀”、“肥尾巴”。<sup>[22]</sup>“高顶峰”说明大量的预算变化聚集在0附近,大部分的预算变化是渐

表1 预算决策模型变量说明表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操作化	变量类别	单位	数据来源
因变量					
环保支出变化	ENV	(第t年环保支出-第t-1年环保支出)/第t-1年环保支出	定比变量	%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自变量					
注意力					
决策者环保注意力	LEA	环境保护在每年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工作重点的排序	定距变量	-	政府门户网站
体制摩擦					
决策成本	DEF	第t-1年一般预算收入-第t-1年一般预算支出	定比变量	亿元	中国财政年鉴
	BUR	环保部门的行政干部人数/环保部门在编人数	定比变量	%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交易成本	FEE	企业排污费征收额	定比变量	亿元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COM	交纳排污费的企业数量	定比变量	万个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TAX	第二产业税收收入/税收收入	定比变量	%	中国税务年鉴
控制变量					
工业化	IND	第二产业产值/全部生产总值	定比变量	%	中国统计年鉴
城市化	URB	非农业人口/总人口	定比变量	%	中国统计年鉴
人口密度	POP	地区年底人口总数/地区国土面积	定比变量	平方千米/人	中国统计年鉴
人均收入	CIT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定比变量	元/人	中国统计年鉴



进的。“瘦肩膀”说明中等程度的预算变化比较少。“肥尾巴”说明存在比预想要多得多的极端变化。右端的尾巴要比左端的尾巴明显长很多，说明预算大幅增长要远多于预算大幅削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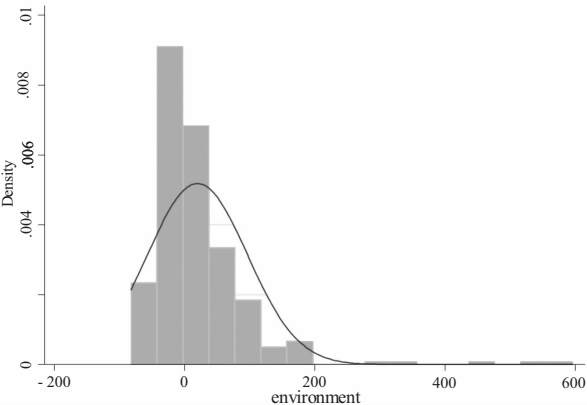


图3 各省环保支出变化直方图

(三)正态性检验

从预算变化分布的峰度系数和直方图直观上来看，我国各省环保支出变化不符合正态分布的特征，即不符合渐进预算决策模式。下面进一步用统计学方法来验证这个结论是否正确。

经过 Kolmogorov-Smirnov 和 Shapiro-Wilk 正态性检验，发现两个检验的结果都是显著的，否定正态分布的原假设，从而可以判定我国 2000—2010 年 30 个省的环保支出变化不符合正态分布假设，也就是说，环保支出变化不是渐进的，而是间断均衡的。整体上来说，我国省级环保支出决策是符合间断均衡模式的。

表4 全样本正态性检验

检验名称	参数	显著性
Kolmogorov-Smirnov test	3.865	.000***
Shapiro-Wilk test	0.756	.000***

综上所述，我国省级环保支出决策是符合间断均衡模式的，而不是渐进模式，假设 1 成立。这个结论反映了植根于西方民主政治背景的间断均衡预算决策理论在中国同样适用，体现出该理论强大的适应能力。

五、环保支出决策的影响因素

(一)自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各个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中可以发现，资源拥挤程度、排污费收入、缴纳排污费企业数量差异较大，离散系数均超过了 0.8，其余变量的差异比较小。

(二)数据处理

首先对我国省级环保支出进行单位根

检验，LLC 和 Fisher 单位根结果都显著，说明不存在单位根。然后对变量进行共线性检验，发现所有变量的 VIF 值都小于 2.5，说明变量共线性不明显。接着确定变量的滞后期，基于预算决策过程的观察，资源拥挤程度、科层化程度、排污费收入、排污企业数和第二产业税收比重对环保支出增长率的影响是滞后一年的，需要滞后处理，在变量代码加上前缀“L\_”。决策者环保注意力对环保支出决策的影响是当期的。

(三)面板模型结果

1.模型筛选

表 6 报告了预算决策混合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从沃尔德检验 (Wald Test) 结果来看，检验值为 0.68，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不存在个体效应，混合回归模型比固定效应模型更有效。从拉格朗日乘数检验 (Breusch and Pagan Lagrangian Multiplier Test) 结果来看，检验值为 3.46，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存在个体随机效应，随机效应模型比混合回归模型更有效。从以上两个检验结果来看，应该选用混合回归模型，无需再进行豪斯曼检验了。反映出预算决策模型存在随机的个体效应。

2.假设检验

根据表 6 中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在 6 个解释变量中，决策者环保注意力对环保支出增长率的影响最大，它在 0.1 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弹性系数为 2.518，说明在控制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决策者环保注意力增加 1 个单位，环保支出的变化率就会增加 2.518%，假设 1 成立，决策者的环保注意力积聚程度越高，环保支出变化越大。

体制摩擦包括决策成本和交易成本，决策成本中的资源拥挤程度和交易成本中的排污费征收额以及第二产业税收比重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决策成本(资源拥挤程度)在 0.01 水平上显著，弹性系数为 -0.1，交易成本(排污费征收额)在 0.05 水平上显著，弹性系数为 -4.23，交易成本(第二产业税收比重)在 0.1 水平上显著，弹性系数为 -1.546。说明

表5 自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名	单位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离散系数
决策者环保注意力	-	0	19	5.32	0.55
资源拥挤程度	亿元	25.35	2396.95	380.28	0.84
科层化程度	%	14.23	59.62	27.63	0.24
排污费收入	亿元	0.0775	27.47	3.74	1.02
缴纳排污费企业数量	万个	0.12	14.18	2.25	0.88
第二产业税收收入比重	%	12.17	60.44	40.18	0.23

表6 2001—2010年预算决策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混合回归模型(Pooled OLS)	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	随机效应模型(Random Effect)
因变量	环保支出变化	ENV			
自变量	决策者环保注意力	LEA	2.518*	1.420	2.518*
			(0.096)	(0.446)	(0.094)
体制摩擦	决策成本-资源拥挤程度	L_DEF	-0.061***	-0.100***	-0.100***
			(0.000)	(0.000)	(0.000)
	决策成本-科层化程度	L_BUR	-0.507	-2.645	-0.507
			(0.567)	(0.153)	(0.567)
	交易成本-排污费	L_FEE	-4.23**	-6.576**	-4.23**
			(0.013)	(0.016)	(0.0012)
	交易成本-企业数	COM	0.615	0.196	0.615
			(0.846)	(0.718)	(0.846)
	交易成本-税收比重	L_TAX	-1.546*	-1.112	-1.546*
			(0.099)	(0.627)	(0.098)
控制变量	工业化	L_IND	-0.426	-0.277	-0.426
			(0.678)	(0.889)	(0.677)
	城市化	L_URB	-0.252	-0.728	-0.252
			(0.592)	(0.691)	(0.591)
	人口密度	L_POP	-.012	-.081*	-.012
			(0.461)	(0.091)	(0.461)
	人均收入	L_LNCIT	49.987***	75.138***	87.24279***
			(0.000)	(0.000)	(0.000)
	常数项	_cons	-424.063*	-447.583**	-424.063*
			(0.000)	(0.011)	(0.000)
	观测值数目 <sup>④</sup>	N	240	240	240
	可决系数	R <sup>2</sup>	0.1081	0.1925	0.1669
模型检验	沃尔德F检验值	u_i=0	0.82		
	沃尔德F检验显著性	Prob>F	0.726		
	拉格朗日检验卡方值	Chi2			3.46
	拉格朗日检验显著性	Prob>Chi2			0.0628*

注:表中括号内为p值,\*\*\* sig.<0.01, \*\* 0.01<sig.<0.05, \* 0.05<sig.<0.1,混合回归模型报告的R<sup>2</sup>为Adjusted R<sup>2</sup>,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报告的R<sup>2</sup>为Whitin R<sup>2</sup>。

在控制其他条件的情况下,资源拥挤程度增加1亿元,环保支出增长率就会降低0.1%;排污费征收额增加1亿元,环保支出增长率就会降低4.23%;第二产业税收比重增加1%,环保支出增长率会降低1.546%。假设3.1和假设3.2均成立,决策成本越低,环保支出增长率越大;交易成本越低,环保支出增长率越大。而决策成本中的科层化程度、交易成本

中排污企业数不显著。决策者环保注意力、决策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显著证实了理论命题是成立的,决策者注意力和体制摩擦共同影响着预算支出的变化。决策者注意力积聚程度越大,体制摩擦越小,预算支出变化越大。

在控制变量中,工业化、城市化和人口密度均不显著,只有人均收入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 (四)结果解释

##### 1.科层化程度不显著

决策成本中的科层化程度在随机效应模型中不显著,原因可能是由于其区分度低所造成的。经过科层化程度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纳入回归模型的科层化程度2000—2009年的离散系数仅为0.24,说明其差异性非常小,不足以引起环保支出的大变化。

关于科层化程度与预算变化的关系在国外学界是存在争议的。一派认为科层化程度能够带来更大的预算变化。因为科层化不是组织应对外界变化的阻力,恰恰相反,科层化提高了组织应对变化的能力,因此科层化能够使得预算变化的出现更容易。<sup>[30]</sup>

另一派则认为科层化程度会降低预算变化,

即两者存在负相关关系。储波和莫伊认为科层化会降低组织的应对外界变化的能力。<sup>[26]</sup>罗宾森发现科层化程度越高的学区,其预算变化分布的峰度系数越小,越接近于正态分布,也即接近于渐进增长模式,这是因为科层化程度会增加决策制定时需要协调沟通的层级,增加了决策成本,增加了组织的体制性摩擦,要作出政策改变变得异常困难,



减少了组织主动进行政策改变的意愿,导致组织回应外界环境变化的反应非常缓慢,因此政策和预算的大变化出现的频率比较低。<sup>[9]</sup>

尽管进行模型估计时科层化程度不显著,但是本研究仍然想探求我国的科层化程度与环保支出变化的关系,以回应美国学者的争议。对两者进行斯皮尔曼相关性检验(Spearman's Test)结果显示,两者的相关关系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两者不存在相关关系。但从散点拟合曲线来看,两者呈现出极其微弱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在我国的政治生态背景下,科层化既没有对政府应对外界变化的能力造成正面或负面影响,也没有增加政府制定决策时的沟通成本,因为我国的预算决策一般是自上而下的,领导定“大盘”,因此决策成本不会因科层化程度而有所改变。我国省级环保支出的情况与美国截然不同,科层化程度既没有对其预算变化产生积极影响,也没有产生任何消极影响。

#### 2. 交易成本中排污企业数不显著

在三个模型中,交易成本中的排污企业数均不显著,而第二产业税收的比重显著,与预算变化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地方排污企业数目不足以反映排污企业的整体实力和与政府的讨价还价能力,排污企业还不能非常直接地影响政府的预算决策,只有它们能够牵扯到政府的切身利益,排污企业才能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政府的税收收入越依赖于第二产业的税收,那么排污企业越有能力游说政府,影响政府的环保预算决策,以避免不利于自身经济利益的环保项目的大幅上马。

#### 3. 模型解释

经过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当所有解决问题推动力超过了一定的临界点,决策者的注意力就会被吸引到环境议题上来,并且当推动力的强度足以化解体制摩擦的阻力时,此时有点像金登教授“多源流”理论中的“机会之窗”开启,环境议题得以顺利进入预算议程,环保支出能够克服惯性、打破原有的渐进状态,得到大幅度的增长<sup>[10]</sup>。但是如果推动力小于一定的临界点,不足以对抗阻力的消解作用,那么决策者的注意力将偏离环境议题,环保支出维持渐进水平或者面临削减,不得不为其他成功吸引决策者注意力的议题腾出资源。

经过实证检验,我国省级环保支出之所以呈现出间断均衡的特点,是因为我国省级预算决策符合间断均衡决策模式,即预算决策受决策者注意力和体制摩擦的影响。只有当推动力突破体制摩擦的阻碍,成功获得决策者注意力的垂青,环境议题的“机会之窗”才能打开,环保支出才能获得大幅度的增长。由于“机会之窗”稍纵即逝、弥足珍

贵,所以环保支出只会出现偶尔的间断变化,大部分的年度变化都是渐进的。因此,我国省级环保支出是间断均衡的。

### 六、结论

#### (一) 研究发现

本研究有两个主要发现:一是从我国2000—2010年30个省环保支出预算变化的分布特点,推断出省级环保支出属于间断均衡决策模式,而不是渐进决策模式,为预算决策理论中的渐进主义与间断均衡之争提供了一个支持间断均衡的例子,验证了诞生于美国民主背景的间断均衡决策理论在我国省级环保支出中同样适用。二是用间断均衡决策理论作为分析框架,运用面板模型检验了研究假设,发现我国环保支出决策受到决策者注意力和体制摩擦(决策成本、交易成本)的共同影响,因此呈现间断均衡的特点。

#### (二) 政策建议

现阶段,环境污染治理成为我国的迫切任务,地方政府需要加大治理环境污染的力度,必然要在环保上加大投入力度。针对政府的预算决策过程以及环保支出间断均衡的决策模式,本研究提出提高地方政府环保支出水平的政策建议。

1. 促使核心决策者(政府领导)重视环保工作,把环境质量纳入地方政府领导的绩效考核指标是一项不错的措施。将来,逐步强化环保指标的考核力度,并且挤出考核中数据的水分。

2. 结合经济转型的契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扶植第三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培育新的税收支柱,此举需要各地方领导的远见,忍受转型过程中的阵痛。同时配合环保法律法规的刚性约束,倒逼排污企业注重环保,加快转型升级。

3. 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以期将来逐步改善财政状况,缓解资源拥挤程度。

#### (三) 研究展望

本研究完成了一次充满惊喜的预算决策探索之旅,以预算变化为切入点,揭开了预算决策神秘面纱的一角,预算决策就像是一系列经济社会要素的庞大的联立方程组,是满载而归、得偿所愿还是大打折扣,关键就在于申请者能否在决策过程中赢得足够的支持,<sup>[31][P175]</sup>从而吸引住决策者的注意力并且突破体制摩擦的阻碍,打开“机会之窗”。

但本研究仅仅简单地呈现了变量间的关系,所揭示的关系链条仍然不够清晰,决策机制的阐释有深化的空间,有待将来对预算决策作深入的实地调研来加以完善。

注释:

①“双向运动”最初由波兰尼提出,指市场化运动和社会自我保护运动,他认为现代社会的各种变化是由

一种所谓的“双向运动”所支配的,即“市场的持续扩张以及这一运动所遭遇的在特定方向上制约其扩张的反制运动”,与市场化运动相对的是一种来自社会的制约市场扩张的反向运动,引自马骏.经济、社会变迁与国家重构 改革以来的中国[J].公共行政评论,2010(1):4。

②环境污染治理支出包括三部分,分别为工业污染治理支出、新改扩建“三同时”项目环保支出和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③年度增长率乘以100。

④观测值数目只有240而不是300,是因为税收收入比重缺2000年和2002年的数据。

#### 参考文献:

- [1]马骏.经济、社会变迁与国家重构 改革以来的中国[J].公共行政评论,2010(1):3-33.
- [2]Ho P.Trajectories for greening in China:Theory and practice in Ho P. And Vermeer E.B. China's limits to growth[M].Malden:Blackwell Publishing,2006:1-26.
- [3]吴舜泽,陈斌,逯元堂,王金南,张治忠.中国环境保护失真问题分析与建议[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3):112-117.
- [4]Key V.O.The lack of a budgetary theory[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40(34):1137-1144.
- [5]Walker M.L.Municipal Expenditures. Baltimore, Maryland:Johns Hopkins Press,1930.
- [6]Lewis V.B.Toward a Theory of Budgeting[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52(12):42-54.
- [7]赫伯特·西蒙著,杨砾,韩春立,徐立译.管理行为——管理组织决策过程的研究[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
- [8]Lindbom C.E.The Science Of 'Muddling Through'[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59(19):79-88.
- [9]Robinson S.E.Punctuated equilibrium models in organizational decision making in Morcol G.eds.. Handbook of Decision Making [M].New York: CRC Taylor and Francis,2007:133-149.
- [10]马骏,叶娟丽.公共预算理论:现状与未来[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6(3):336-344.
- [11]Davis O.A.and Dempster, M.A.H.and Wildavsky, A.A Theory of the Budgetary Process [J].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66,61(3):529-549.
- [12]Crecine J.P.A computer simulation model of municipal budgeting [J].Management Science,1967,13(11):786-815.
- [13]Berry, W.D..The Confusing Case of Budgetary Incrementalism:Too Many Meanings for a Single Concept [J].The Journal of Politics,1990,52(1):167-196.
- [14]Bailey J. and Conor R.O.Operationalizing Incrementalism:Measuring the muddles [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75,35:60-66.
- [15]Rubin J.S.Aaron Wildavsky and the Demise of Incrementalism[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89,49(1):79-81.
- [16]布莱恩·D·琼斯,李丹阳译.再思民主政治中的决策制定:注意力、选择和公共政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17]邝艳华.预算决策理论述评:理性主义、渐进主义和间断均衡[J].公共行政评论,2011(4):145-162.
- [18]Wildavsky A.The politics of the budgetary process[M].Boston:Little brown,1964.
- [19]True J.L.Is The National Budget Controllable?[J].Public Budgeting and Finance,1995,15(2):18-32.
- [20]国家环境保护局.中国环境保护21世纪议程[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
- [21]Padgett J.F.Bounded Rationality in Budgetary Research[J].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80,74:354-372.
- [22]Jones B.D.and Baumgartner F.R.and True J.L. Policy Punctuations:U.S. Budget Authority,1947-1995[J].The Journal of Politics,1988,50(1):1-33.
- [23]Jones B.D. and Sulkin T. and Larsen H.A.Policy Punctuations in Americ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J], American Political Review,2003,97(1):151-170.
- [24]Breunig C. and Koski C.Punctuated Equilibria and Budgets in the American State [J].The Policy Studies Journal,1974,34(3):363-379.
- [25]Hartley T. and Russett B.Public Opinion and the Common Defense:Who Governs Military Spend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2,86:905-915.
- [26]Chubb J.E. and Moe T.M.Politics, Markets, and America's Schools [M].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90.
- [27]Mortensen P.B.Policy Punctuations in Danish Local Budgeting [J].Public Administration,2005,83(4):931-950.
- [28]Jun Ma.The Dilemma of Developing Financial Accountability without Election-A Study of China's Recent Budget Reforms[J].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2009,68(1):62-72.
- [29]章泉.中国城市化进程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基于中国地级城市数据的实证检验 [M]. 教学与研究,2009(3):32-37.
- [30]Meier K.J. and Polinard J.L. and Wrinkle R.D. Bureaucracy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causality arguments about public schools [J].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00(4):590-602.
- [31]蒋洪.公共财政决策与监督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

(编辑 刘晖霞)

(3)

### **China's Public Servants Recruitment from Top Universities : Policy Innovation or a Waste of Talents**

——A Case Study on J Province

*Yu Junbo Teng Liang*

*(School of Administration , Jilin University , Changchun 130012)*

**Abstract:** The practice of recruiting public servants from top university graduates, which aims at bringing in more talented people so as to enhance government performance, has spread across local Party committees and local governments in China. By using survey data and in-depth interview records of J province's recruits from Tsinghua University,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of such practice and its consequential problems.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clude that: quality of life, working environment and prospect for promotion are three latent factors mediating the recruits' satisfaction toward the policy practice. Furthermore, the income level, marital status, attention from supervisors, closeness with colleagues, possibility of obtaining meaningful training and assignments and fairness of promotion, have been respectively identified as variables that associate with three latent factors. The connections among policy disruptions due to leadership turnover, discretions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these associating variables are examined in the end.

**Key words:** Top university recruits; Public servants; Promotion; Policy consistency

(4)

### **The practice , Variable Influence and Application Limits of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Zhao Guangyong*

*(Schoo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 Hangzhou 311121)*

**Abstract:**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is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ies of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a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is that common people participate directly in 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and implementation.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is helpful for decision-making democratic and scientific, enhancing the legitimacy and credibility of government by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people; to common people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governance can influence decision-making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then gain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power.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improves social management through citizen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social culture influence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also has its limits, the most appropriate stage on the local level. From participatory budget to community governance,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local government's innovation. The practice of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obtains significant results.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is making the local government management mode change.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y promote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Deliberative democracy; Civic participation; Governance

(5)

### **Environmental Expenses Decisions: Incremental or Punctuated Equilibrium**

——An Analysis of Chinese Provincial Panel Data

*Kuang Yanhua*

*(School of Finance and Tax ,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 Guangzhou 510320)*

**Abstract:** The blind pursui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has not been enough attention to our government, the long-term shortage of environmental expenses, resulting i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ntinued to deteriorate. The fac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brought about by the pressure, the state governance should respond positively to, however,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penditure is not only not been steady growth from year to year, but in a severe state of fluctuation, and even experienced a substantial reduction. Wh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penditure changed like this?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the expenditure change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penditure changes for the period 2000—2010 in 30 provinces found that it belongs to punctuated equilibrium model. Based on punctuated equilibrium decision theory, the research develop a framework of the policy makers attention – the institutional friction and develop two hypotheses, with analysis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anel data the research test the hypotheses and find that budget decision-making is affect by decision-makers attention and the institutional friction s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penditures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unctuated



equilibrium. When policymakers divert attention from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institutional friction is very large, the environmental expenditure is difficult to b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Key words:** Budget changes; Budget decision-making; Punctuated Equilibrium; Incrementalism

(6)

### How American Justice Regulate Public Protest?

——Doctrine of“Public Forum”and its Implications

Wang Jiang wei

(The Party School of Jiangxi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Nanchang 330003)

**Abstract:** The experience of American justice regulate public protest is that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law and justice in the framework of doctrine of public forum: on the one hand, according to constitution and law provide adequate public forum for citizens; on the other hand, through judicial precedent established boundary and rules of public protest and government regulation. The article expounds the growth, content,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public forum doctrine. The enlightenment of American experience is that governance group events should open system space in order to provide public forum for citizens legitimate expression; based on the law to classified management of public protest; give full play to the function of established rules through justice.

**Key words:** Public forum; Judicial regulation; Public protest; Group events; Assembly Law

(7)

### Social Justice , Political Efficiency and Political Trust

Yuan Hao Gu Jie

(School of Social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rrelations of political trust with social justice and political efficiency and the changes i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social justice and political efficiency as the quintiles of political trust changes. The results indicate strong correlations of political trust with social justice and political efficiency. The results from quintiles regression models prove that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s of political trust with political efficiency and social justice decline as political trust goes up. Among those with lower levels of political trust, political efficiency improves political trust. Among those with middle levels of political trust, political efficiency reduces the relation between social justice and political trust. Among those with higher levels of political trust, political efficiency strengthens the relation between social justice and political trust. Finally, this paper discusses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Key words:** Political trust; Social justice; Political efficiency; Interaction effects

(8)

### Exploring the Determinants of Happiness for Immigrant Chinese Engineers in Japan

——Evidence from Their Life Stories

Li Wei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hangha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Shanghai 200233)

**Abstract:** This exploratory study aims to understand the integration of immigrant Chinese engineers based on their satisfaction with life in Japan and to understand the factors that explain it. Specifically, we explore the determinants of happiness associated with the migration experience. We present some preliminary findings from a qualitative study in which in-depth interview data from a small sample of immigrant Chinese engineers in Japan highlights a number of ideas that together form a soci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people's perceptions of and reflections on the idea of happiness. We then attempt to extrapolate “the facts” from their life stories in order to construct a causal account that can explain the causes of happiness. First, we abstract four explanatory variables from the interview and the ethnographic data: job prospect, marital status, ties to the home society, and ties to the host society. We then work with life story data in a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The analysis results suggest that maintaining ties to both the host society and the home society are important factors for understanding these immigrants' happiness. Marital status is another key factor associated with immigrants' happiness.